

明代別集叢刊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〔明〕耿定向◎著 傅秋濤◎點校

耿定向集

上

明代別集叢刊

耿定向集

上

〔明〕耿定向◎著 傅秋濤◎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點校整理說明

此集名爲「耿定向集」，其實爲耿定向與其二弟定理、三弟定力之合集。如此編著，也由耿定向生前自編其文集時，即已把兄弟的言論混合爲一。定理在學術上先于其兄入道，定向早年從其弟學，故定向曾集其言論爲「耿子庸言」，他提倡「庸言庸行」，故可以說是「耿子」的「庸言」，也可以說是「耿子庸（定理，字子庸）」的言論。這些言論與其後期的思想差距頗大，讀者自能會之。定力欲發展自己的思想，定向則勸其回歸「家學」，表達了曾要形成「合力」的意圖，儘管結果可能並不如意。大概以此之故，定力後來也做了高官，卻未追隨當時的時尚編輯自己的文集。兩位老弟遺留下來的文字不多，故仍以兄長之名名之。三耿爲晚明政界、學界均有重要影響的名人，與當時的重要人物均有往來，編輯其文集，對於了解當時的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演變，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。

一

耿定向（一五二四——一五九六），字在倫，號楚侗，世稱「天臺先生」，湖廣黃安（今湖北紅安）人。嘉靖三年十月初十日，生於麻城縣長安里嚴冲祖宅。嘉靖四十二年（一五六三），由耿定向提議，麻城與黃陂各析一部分新建黃安縣，遂稱黃安人。定向之父靜庵公，

母秦氏。耿家屬于一般的自耕農，不享受任何特權。據耿定向《觀生記》所載，他很小就參加官府所徵派之徭役，家族經濟常常處於破產邊緣。定向本人亦經常受到饑餓的磨煉，生活非常困頓。直到嘉靖三十一年（一五五二）考中舉人，耿家的境況才有明顯的改善。

耿定向屬於官僚兼學者型，而以政治職業為主；他不尚空言，以學問作為從政為官的必要的修養。耿定向的官場生涯，可以分為三個時期：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，到加入徐階政派，為第一個時期。由攻擊吏部尚書吳鵬，到被舉薦為南京提學御史，乃到貶為橫州判官，都與徐階有明顯關聯。

嘉靖三十五年（一五五六），耿定向成進士，授行人司行人。三十八年秋，授雲南道御史。在任期間，疏劾吏部尚書吳鵬。疏中稱：「銓衡者，守令之本源也。欲察守令之貪殘，而不察銓衡之淑慝，是舍本源而求之末流，臣慮其難矣。」列鵬六大罪狀以及眾以賄進者，而暗指時任首輔的嚴嵩。嘉靖皇帝震怒，斥鵬，對嚴嵩的信任也有所動搖。危疑中，張居正「誨我一忘字」。本年，轉巡城御史。

嘉靖四十年（一五六一），奉命巡按甘肅，著《巡夏約法》三章。在事七閱月，所舉王本固、孫應鰲、孟養性、趙希夔、王崇古等。王崇古為其鄉人，不過王後來樹績邊陲，人不以

爲私。回京述職時見嚴嵩，舉薦張居正、羅汝芳；論張居正爲「此異日可以托國者」，論羅汝芳「此公鄉人中不食煙火者」。

嘉靖四十一年冬，就任南京提學御史。在南京任上，以「崇正學，迪正道」爲號召，建「崇正書院」，選所轄十四郡賢俊入其中而鼓鑄之。對於耿定向在南京的建樹，焦竑評論說：「先生踞師儒之任，六年於茲，摩蕩鼓舞，陳言邪說，披剝解散，新意芽甲，性靈挺出。士蘇醒起立，嘆未曾有，皆轉相號召，雷動從之，雖縻他師者，亦藉名耿氏，海內士習，幾爲之一變。」此論雖不無學生奉承老師之意，大體亦符合事實，而耿定向後來在學術界的名聲，亦在此奠定。

在徐階與高拱的黨爭中，耿定向積極參與，並因此而經歷其官場中的升沉。在徐階得勢時，先後任過大理右寺丞，晉左寺丞等官；高拱時，則謫判廣西橫州。隆慶六年（一五七二），拱敗，起浙江衢州推官。

第二個時期，則以作爲張居正集團的重要骨幹而奠定其官場形象。福建巡撫任上的工作，則是此一階段的典型表現。

萬曆元年（一五七三）二月，晉工部屯田主事；九月，晉尚寶丞。二年八月，晉尚寶少卿。三年，晉太僕少卿，尋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，協理院事。不久，聞母秦太夫人訃，奔

歸。萬曆六年（一五七八），丁憂期滿，以原職起官福建巡撫。次年，朝廷推行「一條鞭法」。耿定向表現積極，福建爲全國性清丈田畝之始。福建地形複雜，定向模擬廣輿圖式，親自擬定丈量「八法」，不數月報完。時海賊林道乾橫行東南，定向雖多方設計擒討，迄無成效。由於朝廷放棄嚴格的海禁政策，有限開放，福建海疆亦無大事。

在任巡撫期間，耿定向把其爲政經驗加以整理，集爲《牧事末議》，寄與張居正。張居正讚揚說：「丈田、賑飢、驛傳諸議，讀之再三，心快然如有所獲。蓋治理之道，莫要於安民。……公諸所條布，訓辭雖若嚴整，而肫肫愛民之意，藹然於言外。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，非世儒所能及也。」萬曆八年（一五八〇），聞父靜庵公訃，解職歸。

第三時期，則以與東林黨的恩怨爲特色。萬曆十二年三月，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。八月，晉左副都御史。冬，疏請從祀王陽明於孔廟，從之。十三年，晉刑部左侍郎。十五年十一月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。十七年十月，召爲戶部總督倉場尚書，疏辭，未任。十二月，九疏乞歸，致仕。

張居正以後的政局，漸入黨爭時期。新進者爭爲搏擊，相煽成風，不顧事實。許多官場達人如陸光祖、王世貞、王錫爵等，多蒙其禍，定向思欲有所挽回，因而與之結怨。耿定向致仕是用以退爲進的方式與黨人鬥法。顧允成的《客問》，則可以看到黨人方面的

反擊。

耿定向沉浮仕宦海四十年，勤於職務，清廉自守，獎拔后进，顧全大局，爲人景仰。朱國禎評論耿定向的爲政風格說：「天臺所經相公用事者，分宜（嚴嵩）、華亭（徐階）、新鄭（高拱）、江陵（張居正）、吳縣（申時行），皆不甚齟齬。觀所與江陵一書，大略可見。……大抵經霜雪一番，增一番光彩，安得人人而悅之？」所謂與江陵一書，即在萬曆五年「奪情」事件中稱張居正爲伊尹，而以攻「奪情」諸儒爲「此學不明」。朱說爲《明史》及四庫館臣所沿襲，影響很大。事實上，耿定向雖然在政治上維護張居正，對張居正以強硬手段「毀書院，禁講學」，也表示抗議。在寫給他的學生吳伯恒、湖廣地方官員及張居正本人的信中，態度都很明確，並不是一個很隨便的政治投機者。

總體而言，耿定向具有一定的平民意識，故能推動以保護中下階層利益爲目標的政治改革，但堅持儒學教化爲主的施政路線，並不贊同張居正「舉先王之禮制，一舉蕩滅之」的思想。可以確認，在政治態度上，耿定向屬於徐階、羅汝芳、胡直之類。

二

耿定向致仕回鄉，並未如當時一般官僚那樣置田買宅，安享晚年，而是爲了集中力量打擊他的朋友與論敵李卓吾（贇）在他們共同的學術圈子中日益高漲的名聲。沒有李卓

吾，耿定向在歷史上的地位，也許完全不一樣。當然對於前者，也是這樣。及至今天，耿定向的知名度也是與李卓吾緊密相聯的。《明史》雖不願爲李贄單獨立傳，終究無法忽視其影響而附於耿傳之中，其中論述耿定向的學術及其與李卓吾的關係說：「其學本王守仁（王陽明）。嘗招晉江李贄于黃安，後漸惡之，贄亦屢短定向。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。贄小有才，機辨，定向不能勝也。」雖立場乖戾，卻也可以看出兩人學術爭鋒的大致情景。

耿定向早已在學術界有名聲，但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退休後所寫，內容也大都是針對李卓吾的思想而發，卻非一種臨時上陣的純粹的衛道情緒與攻訐，仍然可以看到其早期的思考。對應於其政治生涯，耿定向的學術思想發展過程，大致亦可分爲三個階段：第一階段追隨其仲弟以解構程朱理學爲特色，思想激進。焦竑論其在南京提學任上陶鑄士子「新意芽甲，性靈挺出」，殆非虛語。季弟定力在其與李卓吾的爭持中勸其閱讀佛書，讓其回到作爲解構工具的禪學思想方法，定向回以「余于佛書雖未盡覽，友朋所共覽者，廿年前亦曾涉獵一過」，確是事實。

當年，耿定向雖然已經考取了進士，但學術上卻並未入門。這種奇怪的現象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，只有閱讀吳敬梓、蒲松齡，才能有所領會。嘉靖三十六年（一五五七），耿定向以差便返里，時定理覃思大道，有所悟入。針對其兄與人反覆呻吟古典，定理很不

耐煩地說：「聖賢千經萬典，其要語頗不多。諸汎汎酬應之言，不足究心。」此言實爲李卓吾《童心說》中抨擊六經之類激烈言論的先聲，實是禪學解構既有知識與權威的精神之發揮。由此觀點出發，仲子對於道德教化也極爲蔑視，認爲世人所艷稱的「扶世立教」、「參贊位育」，「不過能侏跛聾瞽之所共能者」，任何普通人都做得到，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不可以擔當政治重任。但那時耿定向卻只在經過簡短的辯駁就被說服了，從此歸心王陽明心學。耿定向對他的學生說：「余學實自仲弟子庸發之。」

在定理的引領下，耿家兄弟建立了自己的學術聲望。嘉靖三十七年（一五五八）年，羅汝芳在北京對即將回鄉的耿定向說：「子歸矣。仲子殆天授，非吾儕比，幸與細商之。」李卓吾於隆慶六年（一五七二）在南京初識定理，印象特深：「余自是而後，思念楚控不置，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。」萬曆五年（一五七七），他在赴任雲南姚安知府路過黃安時，見耿定向兄弟，便欲棄官留住。經勸說，留下女兒、女婿，訂下三年任滿來歸之約。

耿定向學問的第二階段，則是接受張居正「循名責實」的考核，以把其學術致之實用爲特色。福建巡撫之任，便是其追求實用的集中表現。在爲《牧事末議》所寫的「引言」中，耿定向說：「世儒類粗簿書而高談性命，然乎？不然。蓋聞儒者之言曰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指若淵且閔矣。今郡伯邑長，非斯民所恃以宅生而寄命者哉？即茲簿書中，

故斯民命脉所存也。……今日性命之精在簿書，非耶？」以此，得到張居正的夸獎。事實上，早在徐階執政時期，耿定向針對時人只願意在北京擔任清華之官穩步上升，便欲聯合二三位同志到地方去任實職。故上述思想也體現了其一貫的精神，是其秉於學問的堅持。

第三階段，耿定向收斂其進取之心，以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為致思的焦點。與李卓吾的鬥爭雖有爭奪學術核心之意，也是此一思想追求之表現。

萬曆八年（一五八〇），李卓吾辭去姚安知府之職，來到黃安。不過，當耿、李朝夕相處時，雙方的分歧便逐漸暴露出來。在政治上採取調和態度的耿定向反映到學術上必然表現某種模糊性，與追求明晰與確定的李卓吾，反差太大。他們共同的朋友周柳塘評論說：「天臺重名教，卓吾識真機。」其實，由定理所確定的耿氏家學具有濃厚的禪學色彩，天臺之「名教」實在只是針對卓吾而言的，是一種出於實用需要的調和態度，而非以名教為基本的學術立場。但是，在政治上的調和態度還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，學術則另有規則。故而，他們共同的學術圈子的核心，便由耿氏兄弟逐漸轉移到卓吾處。

萬曆十三年（一五八五），李卓吾翻印了泰州學派學者鄧豁渠的《南詢錄》，引起耿定向的不滿，雙方的矛盾逐漸公開化。鄧豁渠是趙大洲的門徒，趙大洲就以敢倡「僕之為禪自弱冠以來矣」而被四庫館臣評為「悍」之學者。豁渠學問或許不及其師，但敢於以禪自

任，則有青出於藍之勢。

萬曆十四年，耿定向授意麻城縣令「講學」受到李卓吾一派的抵制，耿、李矛盾進一步激化。縣令「講學」，正是張居正「毀書院，禁講學」政策所屬禁，故自稱為張居正「知己」的周友山跳出來，抵制立場不太堅定的堂兄柳塘。耿定向則把周友山的表現歸咎於李卓吾在背後教唆，作《春鳥秋蟲解嘲賦》（此即卓吾所稱之《二鳥賦》）以譏之。而李卓吾在安排家眷回福建後，即以告別「鄉愿」為辭，由黃安遷居麻城。

萬曆十八年（一五九〇），耿定向致仕回鄉之際，適逢李卓吾的《焚書》出版，書中收錄了李卓吾參與上述爭議的書簡，耿氏感到受了嚴重傷害，必須要作出回應。耿的門生蔡弘甫著《焚書辨》，而耿定向自著《求儆書》，效法古代的衛武公以九十之年求儆於國人，請求大家對自己的批評指教。其間還包括一些非學術的較量，如定向欲以《觀摩記》發柳塘隱私，逼其在思想觀點上附和自己。但雙方各有支持者，力量不相上下。

在激烈的學術交鋒中，除了那些純粹是奔著耿家權勢而來者之外，凡略有學術品格之黃安、麻城本地士紳，如柳塘、友山兄弟、梅國楨家族，到耿定向在南京時的外地學生，如焦竑、祝世祿等，皆傾向李卓吾。即使極為維護師門的管志道，也承認其師學問不夠透脫。最後，在大家的勸說下，耿、李兩人「和解」。耿寫詩道：「自心能自信，大道何藩籬！」

有無言俱陋，諸子蔽且離。（仲）尼、（釋）迦總過影，同異辨等痴！」放棄「攻異端」。李則作《耿楚侗先生傳》，重申與耿家的友誼。

在第三階段中，耿定向以其政治地位追求穩定的社會秩序，並沒有錯，只是不能順應時代需要，向法制社會努力，而仍舊倒向儒學「政教」（政治的道德教化）的禮治套路，把政派之間的利益衝突導向道德上的正義與邪惡對決，雖然在政治上與東林黨有衝突，卻也是晚明學術由心學轉向東林黨學之事實上的前驅。

大致而言，耿定向氾濫於佛、道、儒，而歸宗於儒，以「不容已」為宗，肯定人類的倫理道德、行為格式，一切現象，皆是人的本心的必然的表現。故而，他不滿王龍溪「以照為明，相去千里」的說法，以為「提掇似太重矣」，足以見出其學問的特色。他以「函人」與「矢人」的比喻，強調「擇術」的重要性，肯定學者價值取向對學術思想的意義，也是很深刻的。他的「學問三關」的說法，既是對自己學術經歷的總結，也揭示了學者思想進步境界的一般規律。尤其難能可貴的是，耿定向很推崇民間學者，不僅有鄉村的儒者，還有山林的禪師，為他們作傳，保留了很珍貴的思想史資料。

耿定向一生強力學問，不迷信權威，不隨波逐流，能夠自成一家之學。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評論說：「楚學之盛，惟耿天臺一派，自泰州流入。」以其為「楚學」的代表，符合思想

史的事實。耿、李衝突並不全是學術原因，而是耿定向出於某種利害考量，認為過於尖銳的思想不利於其子弟踏入世俗社會。從李卓吾的結局來看，顯得很有「先見」，雖然也因此而使自己的學問格局不大。

耿定向的學術造詣雖然不能與張居正、李卓吾相比，但在當時思想學術界亦是屈指可數的大家。由於與李卓吾的爭論，耿定向在學術界幾乎成為「假道學」的代名詞，關於兩人的學術論辯很多，多明其異，未見其同，這是很不公平，很不準確的。對他的思想缺乏研究，是當代晚明學術研究的一個嚴重的缺陷。

三

定理，字子庸（一五三四—一五八四），號楚侔。關於其早年的求學生涯，耿定向很少提及，蓋因那些人多屬異端者流，不太光彩。但《里中三異記》所載的方湛一、何心隱、鄧豁渠三位學者，雖未明言，仍然可以發現是楚侔主要的求學對象。據朋友傳說，楚侔曾從方湛一學。湛一很倨傲，經常叫他的門人做僕人的賤役。楚侔以求學心切，只能忍受。楚侔跟隨湛一兩三年，每問學問究竟，湛一都以「又通商量」搪塞。後來看到湛一實在沒有什麼本事，楚侔才離他而去。楚侔還去杭州拜訪當時的傳奇人物胡清虛，很羨慕清虛的排場氣魄。胡清虛住在高牆大宅之中，姬妾十餘人。每傳一道茶，雲板十餘響方出，人

亦如之。胡清虛能把當時御「倭」的統帥胡宗憲玩弄於股掌之上，使其俯首稱弟子。楚倥與朋友談起杭州的印象，不禁感嘆說：「清虛蓋天下大俠也！」

子庸文化水準不高，類似于惠能式的人物，能透過繁瑣的議論，直指本心。有時，兄長不能理解時，子庸不肯獨善其身，實行「哭諫」。耿定向描述子庸自曲阜朝拜孔廟回到南京時，兄弟倆「講學」的情景說：「比緣仲弟自闕里歸來，若有所啟，目擊區區迷誤，痛哭垂涕，相逼一場，僕因而困悱者幾晝夜。而二三子又更進脩勇猛，更相啟助，日來始少省發。」

萬曆十二年，耿定理去世。李卓吾認為，耿定理的離去，使他與天臺發生分歧時缺少了一個中間人，遂致參商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定力（一五四一—一六〇七）字子健，號叔臺。耿子健考中隆慶五年（一五七一）進士，先後做過福建提學副使、成都知府、通政司左通政、南京操江都御史等官。

在耿、李之爭中，子健取中立的勸和立場。他對兄長過於嚴厲的衛道態度不以爲然，引起天臺的嚴重不滿，認爲他不應該與有清談傳統的江左學者搞在一起。「乃吾家學旨，弟亦自破壞。……是夕撫枕，涕泗橫下不已，蓋悲仲子之不可作，而印可之無從也。」仲以哭諫伯，伯以哭諫季，由身、家以及天下，已溺及溺，與人同其樂，自不容已，可見耿氏學風

之一斑。

四

耿定向在世時就把自己的文章不停地印刷，以分贈門人弟子以及親朋好友。由其文集中可知，這樣的單行本多至幾十種。由於事先得到編輯，故去世不久，即由其門人劉元卿在萬曆二十六年編輯出版了《耿天臺先生文集》二〇卷。另注明有「集外完書」如《碩輔寶鑒》、《先進遺風》、《小學新編》、《權子雜俎》、《閨訓禮纂》、《觀生記》等，未編入文集。由作者所編輯的著作還有諸如《象山先生要語類抄》、《批點近溪子集》、《黃安初乘》、《耿氏家譜》等。劉元卿所編文集，現存於南京圖書館，被收入「四庫存目叢書」。

在此版本之外，另有民國初年武昌正信印務館所刊陳鴻謨編輯的《耿天臺先生全書》。陳本對其版本來源未作交待，但就其所收之文章看，除了收入劉本所不收的書外，字句也略有區別，顯然不是劉本的翻印。該本雖然號稱「全書」，實際上是一個選本。即使收入的文章，編者也對之進行了刪改。如抹掉作者對佛、道的引述，對朱注的批駁，改變字句的意義。考證《湖北文徵》所錄耿定向文，則陳本應來自《天臺遺書》。該本現編者未能見到。

本次點校，將依照如下規則進行：

一、本次編校，綜合劉元卿萬曆二十六年所刊《耿天臺先生文集》二〇卷本與陳鴻漠所編《耿天臺先生全書》一六卷本，收入劉本所無之以譬喻談學之《權子雜俎》及自傳之《觀生記》。其餘道德教訓之書，意義不大，一概從略。

二、陳本所收種類雖然較全，但錯訛較多，年代較晚。則兩書重複者，仍以劉本為底本，參校陳本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仍出注。劉本體例較為駁雜，則根據內容與性質，參考陳本予以重新編排。凡原書在編輯時內容未被分散部分的序、跋，一律回歸原處，以示統一。

三、見於他人文集及地方誌書的個別散篇，以及鑒於耿定向自己已經編入定理的言論，其三弟耿定力的少數文章，如為李卓吾《藏書》所作序文等，也全部予以收入。除管志道相關文章太多外，朋輩來往之書信、評論，悉編入附編中。

四、書中生僻的異體字，如「𪛗」之類，都改為通用之「鮮」字；「己」、「巳」不分等，亦根據上下文予以確定。錯別字影響閱讀者，則以括弧標出更正字。原本使用的簡體字，仍予保留。

在校點將近完成時，發現《儒藏》精華編集部二六二冊劉元卿本《耿天臺先生文集》胡正武校點本，酌予參考。

目錄

點校整理說明

卷之一

詩詠詞像贊附

反身四詠示諸姪

小像贊

三言訓語

四言

三老圖

誄劉魯橋詞

四求圖

評白下楊、焦兩生詩

傷孟篇

遷喬篇

目錄

一
一
一
一
二
二
三
三
四
六
六
七

戏嘲陶並序

誦陶、邵詩感賦並序

論交示兒姪

答胡正甫論末後着

贈徐茂才

憫時謠

別李士龍四十韻

七十吟二首

其二

七十吟

詰知

病懷

贈劉調父應聘北上國子之任二首

夜坐訂學載賦贈

答楚王孫潛智見示詠懷之作用意

七
八
九
九
一〇
一〇
一二
一三
一三
一四
一四
一五
一五
一六